



第三辑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总顾问 李学勤

墨家思想新探

薛柏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三辑

金景芳师承学者文库

总顾问 李学勤

墨家思想新探

薛柏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家思想新探/薛柏成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12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ISBN 7-207-07216-3

I. 墨... II. 薛... III. 墨家—思想评论
IV. 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599 号

责任编辑: 孙国志
装帧设计: 李 梅

墨家思想新探
Mojia Sixiang Xintan

薛柏成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50 千
印 数 1-2 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216-3/K · 820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薛柏成，1966年生，吉林镇赓人。1989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所先秦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野史》《叶赫那拉家族史研究》《东汉三国》等六种；发表《论墨学复兴与近代世风伦理之转变》《〈礼记〉与墨家思想的关系》《墨家思想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影响》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现为吉林师范大学专门史学科负责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吉林省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历史学会理事等。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

- | | |
|----------|-------|
| 周代家庭形态 | 谢维扬 著 |
| 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 葛志毅 著 |
| 周代礼俗研究 | 常金仓 著 |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二辑）

- | | |
|---------|-------|
| 易学考论 | 梁韦弦 著 |
| 教化的哲学 | 李景林 著 |
| 谭史斋论稿三编 | 葛志毅 著 |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三辑）

- | | |
|------------|-------|
| 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 | 许兆昌 著 |
| 墨家思想新探 | 薛柏成 著 |

投稿邮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古籍辞书编辑室

联系电话：0451—82308172

联系人：孙国志

出版说明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正是在此理念下编辑出版的。《文库》主要收录金景芳先生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又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相信,《文库》的出版,对于进一步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社会文化发展,将做出有益的探索。



总 序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把一位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众多弟子的著作汇集起来,成为丛书印行,乃是近年罕见的创举。

金景芳先生字晓邨,辽宁义县人,生于公元1902年,卒于公元2001年。他终生献身于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执教小学、中学,1941年进入东北大学,1954年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前后讲授达60年,授业学生难以数计。金先生自1961年招研究生,“文革”后1981年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共培养硕士16位、博士24位,都已作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

金先生享寿期颐,著述等身,其学术渊博宽广,及于文史诸多方面,而其重心在于先秦历史文化。1999年出版的《学林春秋》初编有他的《我和先秦史》一文,篇中将他自己的主要学术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均列于先秦史范围。事实上,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就是先秦史学科的重点,金先生指导的弟子们也都在各自单位对先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录金先生弟子的著述,皆系先秦史方面的专题探讨,可以明显看出其与师学的传承关系。

2003年,金景芳先生弟子陈恩林、舒大刚、康学伟三位教授曾编纂《金景芳学案》,经线装书局出版。该书开首收入金先生《自传》与若干代表性论文,以及金先生受其知遇的金毓黻等人传略,然后列举助手、弟子32人,各录其论作二至三篇。《金景芳师传





学者文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学案》的继续和扩大,但由于所收都是专著,其性质、规模自然又有不同。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在历史上,最能够系统地体现学术师承关系的著作体裁便是学案。谈到学案,大家自然首先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有的学者认为,学案体的出现系受佛教禅宗灯录的影响,这恐怕不真实,或者至少是不确切的。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在《孔子世家》之外,专设《仲尼弟子列传》,根据孔壁古文“弟子籍”,记述孔门的传承事迹。《史》、《汉》的《儒林列传》,也突出了学者的师传关系。作为学案体发轫的朱子《伊洛渊源录》,特点不过是专题单行而已。其后类似作品很多,到黄宗羲的两部《学案》,将这一体裁的优长发挥到极致,于是成为传统学术史著作的典范。

《金景芳学案》和《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进一步阐扬并且改造了学案体的传统。尤其是《文库》,所收录的都是金门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发展,为今后研究现代的学术史提供了实例和佳话。

我是后学,比金景芳先生小30岁,但有机会获见金先生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1961年的一个下午,金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看曾与他同在复性书院的张德钧先生。那天张先生不在,只有我一个留在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就接待金先生,多有承教,最后步行把他送到北京火车站。

从70年代末起,我常前往吉林大学,后来还受聘为兼职教授,每到长春,一定去谒见金景芳先生。蒙金先生不弃,我多次主持他的弟子学位答辩,得以仔细阅读他们的论文,对于金先生指点培育所费苦心和辛劳,有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90年代,在答辩会





上我总是强调金先生以耄耋之年,仍对学生如此尽力教诲,实为学术史上所稀有。《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各书,不少就是他弟子的学位论文,读者不难通过这些作品,看到金先生教学达到的成效。

金先生在《自传》里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读书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不怕难,越难我越想读。又由于我得力在自学,喜欢独立思考。我认为对的东西,敢于坚持,敢于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金先生的著作,贯穿着这种深入钻研、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各位弟子也能继承老师的这种精神,在学科发展中取得多方面的建树成果。《文库》的陆续出版,将会向读者充分展示这一点。

最后我还想向作为金先生弟子的各位学者提一个建议,便是尽快编辑金先生的全集。金先生的论著,有的早已风行,但印数有限,今天大家想读,苦于搜求不易;还有一些文章,尤其是早年所撰,久归散佚,更需要下功夫辑集。全集的完成,将同这部《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一起,成为对这位世纪学人的最佳纪念。

李学勤

2005年2月11日

农历正月初三





序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据《淮南子·要略》讲，墨家是从儒家中分化出来的。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时首先关注的是社会经济问题，欲纠正儒家“三年之丧”和繁礼淫乐对社会生产的阻滞和社会资财的浪费，而提出“节葬”、“节丧”、“非乐”诸“节用”学说。形成学派后又针对世人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攻占侵夺而提出“非攻”学说；非攻学说自墨子中年从事“非攻”活动起，经过了以“义”游说、以“义”“利”游说、以“义”“利”“天志”游说三个阶段，至晚年才最终形成今《墨子·非攻》所载的完善理论。推行“节用”、“非攻”学说是为了“爱人”。墨家又为贯彻“节用”、“非攻”学说而提出“天志”说，为加强内部纪律性而提出“明鬼”说。社会经济方面的“节用”说、社会政治方面的“非攻”说、社会伦理方面的“兼爱”说，宗教哲学方面的“天志”、“明鬼”说，构成了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早期墨家学说。又经后学补充而出现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因而，今传《墨子》53篇所反映的墨家学说，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为推行学说，墨子仿效孔子收徒讲学。墨子教授弟子时注重因材施教、因能分工，让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而形成了墨子弟子中“从事”、“说书”、“谈辩”三大派别。“从事”类弟子从事技艺劳动或守城保卫，其课业内容是“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县”的五种工匠技艺和“学射”等军事技艺；“说书”类弟子以传墨子之学为要务，故十分强调向书本学习，“读书”应是“说书”类弟子的主要学习方法；“谈辩”类弟子以游说诸侯、出仕为官为要务，“揣曲直”即强调自





身的分析和感悟能力的提高,是其学习目标。就思想信仰来说,墨家学团成员统一信奉墨家思想学说,并以推行墨家学说为第一要务;墨家后学中也曾流行过“钜子”信仰。墨家在外派弟子“谈辩”出仕时有整体规划和切实可行措施,被外派的弟子离开所在诸侯国时要回学团报告从而得到许可,可见学团内实行“政治一体化”制度;学团成员从事各种活动的收入和外派为官弟子的收入都上缴学团,由墨子(墨子死后由钜子)统一掌握,统筹使用,可见学团内实行“经济一体化”制度。墨家维系学团内部的手段,在墨子时代,主要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的学团成员的自觉自律;在墨子去世后的“钜子”时代,墨家学团经过了由“准宗教信仰”到“严明法纪”的阶段变化。在公孟为钜子的时代,维系手段在榜样力量之外又增添了宗教信仰。总之,墨家学团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统一行动规划且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准军事化学团。

墨子可能终死于鲁阳,故其所率“从事”类弟子及未竟事业都留在了鲁阳,由孟胜接任首领,成为墨家钜子而掌控墨家学团事务。孟胜死于鲁阳后,田襄子匆匆接位,既无学术实力又无政治实力也无武装实力,所以在众多墨家派系中缺乏号召力和领导权威,因而引发了天下墨者分化,东方有田襄子一派墨者,西方则有“秦墨”。西方“秦墨”有钜子腹䵍,他虽严于律己但不能统一号令和指挥天下墨徒,因有“秦墨”与“东方墨者”争相事秦之斗,终致墨家“钜子”位不传。墨家钜子位不传后,从“相里勤之弟子”群与“南方之墨者”群争为“真墨”而相谓“别墨”,到“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构成了战国后期墨家派系发展繁衍的主线索。

秦人焚书,子学不传;汉初复学,儒家独尊。自汉人起“视墨同儒”的学术观念妨碍了墨学的研究和流传。儒墨学说虽有诸多相异点,但亦有诸多相似点,如两家在政治理想上同主张效法古代先王,两家在治理措施上同重人际关系而不像道家那样效天以言治,等等。而儒墨两家的重要分歧,在于简礼非乐还是重礼重乐,



在于推行人伦等差之爱还是无差等之爱。但在叔孙通为汉家定礼定乐后,简礼非乐还是重礼重乐之争已无社会现实意义;在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神学论并由于汉武帝的推动而大行天下后,墨出于“天志”的兼爱论与儒家出于血缘的等差爱之间的理论差距正在缩小。因此,儒墨两家在学理上有了更多可沟通处,所以不论在黄老占主流思想地位的西汉前期,还是在儒家占思想统治地位的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有更多人主张“儒墨相通”。正是汉代这种“视墨同儒”的学术观念,造成了“墨学中绝”的假相。

魏晋起,佛学渐兴,儒佛道三教鼎立。就伦理思想的博大精深来说,墨子不及孔子;就天人关系论说的深刻贴实来说,墨子不及老庄;就人间关爱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墨家不及佛家。由此种种,南北朝墨学不再像两汉那样与儒家并称,而退出了“主流学术”行列。墨学在学界长久沉寂的局面,是从南北朝开始而不是从秦汉开始的。南朝谈玄崇佛,墨子被崇为道教徒并谓其有“神怪道术”;北朝灭佛崇儒,论墨时多承两汉魏晋旧说。隋唐思想开放,就墨学的流传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在传儒经之外,亦传含有《墨子》在内的其他诸子书,因而发展到韩愈的“儒墨为用”说;另外一种继承了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观点,在维护儒学时将“杨、墨”与“释、老”一同作为儒学的对立学说来对待,典型言论是柳宗元的“墨不如佛”。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开启了千余年来的“儒墨为用”之争。唐前期与中期,社会热点问题由探讨社会治术向探索个人心性转变,所以佛教逐步兴盛,信徒越来越多。在心性问题方面,佛家的解说最为细密,道家次之,儒家再次之,墨家又次之,所以受人重视的程度不同。但是,墨家为理想献身的死不旋踵精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奔走的忘我态度,与佛家的自苦自持、忘我向修精神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尔虽有柳宗元诸人的抨击,斥墨而尊佛,但墨家的流传并没有因为佛教的盛行而就此中绝。唐宋以来的“儒墨为用”之争是宋学反汉学的结果,魏晋至宋元间儒墨道佛关系搅扰纠葛反映着“学术争用”的历史现实。



宋元之际,作为先秦诸子之一家,墨子受到时人的重视,某些知识士子所习课业中有墨学,《太平御览》等类书广录《墨子》,宋元学人重视墨家的学术流变等,都是这一学术风气的反映;但仍有王安石以“性理说”批判墨家、“三苏”重倡“儒墨之辩”等。另外,民间对墨子、墨家的重视,主要基于道教宣传的影响,使民间对“墨子方术”广传而遵奉。朱熹在论墨家弊端时,往往比较佛家论说来批判,并分析佛家“禅学”派、“布施”派与杨朱学说、墨翟学说的关系,努力追寻墨子、杨朱、道家、佛家间的学术关联,并要求人们像孟子辟杨墨那样辟佛。

降及明清,王阳明虽倡“安心保身”以辟墨,但其论墨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当世“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的虚浮学风。顾炎武对《墨子》、墨学与墨家的考证和研究,都成为他扭转宋明空疏之学而开清代考据之学、结束宋明“内向之学”的研究而转向经学子学实学结合研究的众多成果中的重要部分,在墨学研究史上有重要启发意义。明代《墨子》评点著述叠现,清中后期墨学研究特别是《墨辩》研究大兴,都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以求学术之今用的结果。

近代以来,西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使墨学研究大兴,近百年来出现墨学整理研究著作300余种、论文1700余篇。墨学义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墨学史诸问题的梳理和研究,尤其是《墨辩》研究,经众多学者的长久努力,至今天大致明白了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的论说含义。20世纪墨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赖于借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是否用西学思想来比附 and 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呢?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墨家思想、解释墨辩逻辑和论说墨家科技著作失败的例子,应给今后的墨学研究诸多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墨学研究渐次兴盛,出现了诸多青年研究者,更有诸多博士生以此为题写作学位论文。薛柏成博士先以《墨家



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做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得到李学勤、晁福林、赵世超、刘宝才、赵伯雄、詹子庆诸先生一致好评。其后又在此基础上修改成学术专著《墨家思想新探》。专著论述了墨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兼爱”为主旨说明墨家的“五项十事”，探究墨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专著探讨了古代文化传统、战国社会现实与墨家思想形成的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对墨家学派的影响等；又讨论了墨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及其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稷下学术、黄老学说，乃至道教思想理论的关系；并总结了墨家思想的衰微原因，论述墨学近代复兴的历史作用。其中，“墨家学说出于多元”的观点，结合近年来出土文献讨论墨家思想与《唐虞之道》《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的联系，讨论墨家思想与《诗》《书》等儒家经典的关系等“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都甚可称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薛柏成博士定能在墨学研究领域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山东大学郑杰文序于泉城济南对山阁

2006年岁杪





序

薛柏成博士的学位论文《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以《墨家思想新探》出版发行,于付梓之时,索序于我。柏成是我的学生,论文是我指导的,写序自是义不容辞。

柏成是一位在松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祖居镇赉。他原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后师从我的两位师弟康学伟教授和梁韦弦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康、梁两教授于中国古代文献、古代思想史造诣很深,尤精于儒学、易学。柏成得此二位师长教诲之后,为学有长足进步,收获很多,加之天资聪睿,勤奋好学,很快成为了康、梁弟子中的佼佼者。

柏成为学善于独立思考,这是他很大的一个优点。他随康、梁两先生学习,但并未选择两先生所熟知的儒、易诸学,而独偏好《墨子》,用力甚勤。自其本科毕业十余年来,所搜集有关墨家著作不下二三百册,是个很有学术潜力的学子。

我与柏成相识于2002年,是年柏成硕士毕业,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他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墨家思想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以观点鲜明,文字清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柏成的学力,他顺利考进了我们研究所。在学期间,他又接受了我所开设的三礼、三传、诗书易与诸子之学诸课程的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继续深造的文献水平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鉴于柏成治墨学已有多年,且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好的研究基础,我建议他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仍以墨家思想为中心,他便毅然确定了《墨家思想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这一课题。





墨家是战国时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较墨子稍晚的孟子就以杨、墨并言,庄子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韩非子谓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足见其学说在当时就有巨大影响。清代学者俞樾评价《墨子》书说:“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一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判墨家思想云:“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迁与俞樾的说法是对的。墨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墨家虽在汉、魏时期为统治阶级所不喜好,为儒家所排斥等多种原因,几乎中绝。但自近代以来又告复兴,治墨学者,虽未成热点,却也络绎不绝。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墨子》的整理研究之作,墨家思想的论著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柏成作为一位后起的学子,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墨家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两个方面,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他取得了成功,较之前贤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能以新的成绩、新的收获贡献于世人,并在答辩过程中得到了李学勤等先秦史专家的好评。兹撮其要,约有五点:

其一,诚如东北师大詹子庆教授在学位论文评语中所讲:“首先准确概括墨家十论的思想体系。”提出“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其社会思想的基础。其余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九论皆是兼爱思想在政治观、战争观、经济观、宗教观及学派斗争上的反映。这一概括恰当、准确,为本书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其二,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宏富。探讨墨家的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涉及到先秦史的方方面面,用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先生的评价说:“不仅要求作者对于墨家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对于先秦思想有总体而深入理解与研究”,“其内容涉及到整个中国古代及近代的思想史领域的问题,作者有条不紊的论析,反映了作者学



术视野的广阔和学术功力的扎实。”这一评价很公允。作者在文章中不仅涉及到先秦儒、道、法、杂诸家,还涉及到夏、商、周三代思想、涉及到了《易》《书》《孝》等先秦典籍、马王堆《黄老帛书》与《唐虞之道》等战国简书,内容详赡宏富。

其三,在探讨墨家思想渊源问题上,诚如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说:“详尽论述了墨家思想渊源的多元格局”,“在墨学研究中开辟了新思路”。如文章在论列“兼爱”思想渊源时,首先提到儒家的“泛爱”。这是对的。墨子学过儒学,自然熟悉儒家的“爱”。但他抛弃了儒家爱的“差等”。于是又为“兼爱”找到了更古的源头,即是“尧舜禹汤文武”时的“爱”。其实墨子在这里认为尧舜禹与汤文武是一体的。他所说的“爱”指的乃是氏族社会的爱。氏族社会的本质是民主的,爱是平等的,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氏族社会的“爱”,自然被墨家采纳为“兼爱”的内容。又如,文章提出了墨家的“俭”,这是凝炼墨家“节用”、“节葬”、“非乐”而成的“俭”。文章指出了他的三个来源,一是儒家的“节用”,二是道家的“三宝”中的“俭”,三是夏禹的俭朴。这也很精辟。尤其是禹,被墨子看做是“俭”的榜样,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他“亲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置万国”。故为墨家目为典范,要求“后进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总之,他将墨家思想解析开来,放到战国各家各派中去,寻找各家的相互影响,又到古代典籍中去印证,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其四,文章探讨墨家思想的影响时,正如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所说:“把墨学与当时存在的诸家之学一一加以比较,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见解。”就其主要之点来说,如孟子的反战观受墨子“非攻”的影响;荀子的“兼利天下”受墨子“兴天下之利”影响;《庄子》中的“明于鬼”是受《墨子》“明鬼”的影响;法家的“任贤使能”受墨家“尚贤”影响,其“上同”亦源于墨家的“尚同”。不过文章也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之处:墨家的“尚同”,是自下而上的,君主

